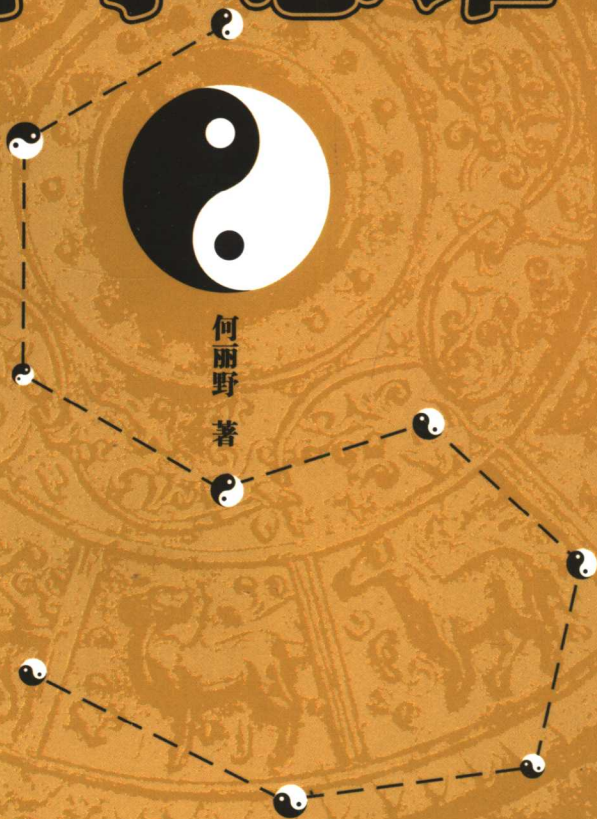


八字易象

与

哲学思维



何丽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八字易象

八字易象

哲学思维

BAZIYIXIANGYUZHUXUESIWEI

B221.5
H188

八字易象

与

哲学思维



何丽野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

藏书



200293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何丽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004-4666-7

I. 八… II. 何…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9965 号

特约编辑 李登贵

策划编辑 陈彪

责任校对 尹力

封面设计 河东河西工作室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840171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果当年我们的先人能够从《易经》的卦象中发掘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源头，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从八字易象中找到一点对于现代哲学和文化的借鉴意义呢？

绪 论

康德曾经有个被后人广泛接受的看法，就是我们认识任何事物，都是以人类已有的概念范畴，即所谓“先验统觉”去整理感觉材料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先验统觉”，认识是不可能的。康德不知道，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种不需要概念范畴但也同样能达到对事物的认识的思维方法，这就是中国“象”的思维方法。如果套用康德的说法，那么我们可以说，古代中国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象”与感觉材料结合的结果。中国人依据这种“象”的思维方法，不仅建立了古代的医学、天文、地理、军事、管理等等一系列具体科学，而且也建立了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

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四书训义·卷八》）这个理是“于象数而得理”。“在天而为象，在物而有数，在人心而为理。”（《思问录·内篇》）这个象就是阴阳五行之象。

阴阳五行之象有很多。例如八卦之象、五行之象、太极图象、河图洛书之象，以及邵雍等人围绕《周易》搞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象。八字易象也是其中一个象。

西方哲学对中国“象”的哲学思维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黑格尔是少数的几个注意到中国哲学的意义的西方人之一，但他也不懂得《周易》所代表的“象”的思维方式的意義。他把《周易》的卦象也看作“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因此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到《周易》时满是不屑的口气，说：“他们（指《周易》时代的中国人——引者）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认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的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一套具体的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①

黑格尔之看不起《周易》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以理性的角度、“存在者”的眼光看《周易》之象。如果只是这样看，象当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以一阴一阳两个爻表示事物的两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将事物归类，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不过是赫拉克利特时代的思维水平。它确实只是“直观的”、“感觉的”。但实际上对“象”不能简单地这样看。

中国古代的象有三层意思：一是指自然界的存在物，二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的反映。这两者的意义人们都已经注意到了。但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指事物存在的“势”。也就是“存在者”的“存在”。“象”并非只是对于事物的一般的“是”什么的认识，而且还是对于“存在”的领悟，是“本质直观”。这点是人们一直没有注意的。因为这要以胡塞尔以后的西方哲学的眼光才能看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版1983年版，第120—121页。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仍有一些研究者以为黑格尔讲《易经》“是有绝对权威的”，是对《周易》的称赞，因此常常引用这句话表示西方人之重视《周易》。其实，联系上下文，黑格尔此话只是以《周易》对中国人而言的，实际上是带有嘲笑中国人浅薄的意味。

出来。其实，“象”的思维方式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

我认为研究八字易象有两个意义。首先，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存在于中国社会达千年之久，即使现在，也还相当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城乡，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单是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存在的本身，就是有其研究价值的。这是一。这一点，前贤已多有述及。其次，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象的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哲学意义。这也正是本书所要论述的中心内容。而这点，国内“学术”界鲜有涉及者。

哲学是研究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学说。人与外部世界是个什么关系呢？一开始，人们认为是服从的关系，所以最早的哲学是“自然哲学”，研究的是外部世界的规律（本质）；后来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看作是认识、整理的关系，所以研究的是认识的规律（本质）；现在认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构成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哲学研究生存、实践、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这些关系中，实践关系是最基本的。那么，在实践中，人与外部世界又形成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人与外部世界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系统关系。即人与他所改造的对象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以人为主体的、为价值中心建立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系统。人与这个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即主体与客体，构成四种关系：生我、克我、我生、我克。不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一个组织（如企业）、个人与社会，以至于一个组织与社会、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只要是主体与客体，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模式来表示。而这正是八字的“象”给我们提供的模型。八字易象，是一个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人与外部世界系统关系的模型。这个“象”，源于《周易》，又高于《周易》。术士们在长期的推算命运过程中形成的对八字的研究，实际上体现了这个系统的运行模式和思维方式。所以，研究八字易象及其方法，

对我们深入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实践关系所构成的系统，是很有益处的。这也就是八字易象的哲学主要意义所在。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哲学发展的历程和所面临的问题。

一、哲学及其历史发展

哲学，又称形而上学。或者说，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只有回答了形而上学问题才可能接下来回答诸如人的问题、自由与必然的问题、价值问题等等。那么，什么是形而上学呢？

中西方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西方哲学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关于“存在（是）”的学说。中国哲学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关于“道”的学说。《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其实，“是”从其本质意义上也是“道”。那么，道是什么？我认为道就是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在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我们叫它规律性，在人身上，我们叫它命运。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体科学研究具体领域的必然性，哲学研究整个世界，即自然、社会和思维过程中的必然性。这是从古至今哲学皆同的。可以说所有的哲学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恩格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第二个方面，思维能否认识存在，即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就是寻找世界最后的原因的学问。罗素说，哲学是“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① 英国当代哲学家艾耶尔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并且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不依赖事物与我们的关系而按照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

事物的本来面目描述事物。”^① 我认为，如果把这些观点都归纳一下，从必然性的角度再把它具体化一下，我们可以把哲学的核心问题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1. 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必然性？
2. 这个必然性是什么样的？
3. 如果有这样的必然性，我们能不能认识它？
4. 如果我们认识它，我们的语言能不能正确的表述它？

因此，本体论问题与方法论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如果认为本体是形而上学的（在这里是与辩证法对立的意义上说），那么方法论也必然是形而上学的，如果认为本体是矛盾的、辩证的，那么方法论也就必然是辩证法。如果认为本体是系统的，那么系统论系统方法才有立足之地。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中西方哲学基本上都承认世界有必然性。古希腊哲学最早关于俄狄浦斯的个人命运的神话就鲜明地体现了必然性对于个人生存的意义。这个命运（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越是逃避它，越是跟着它走。或者说，人逃避命运的行为本身恰恰是命运的体现。所以，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刻着一句著名的话：“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也就是认识命运，认识必然性。尽管也有人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和运转都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或者万物都仅仅是偶然的的存在，不过就绝大部分哲学家来说，都承认万事万物是有其必然性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能不能认识它。

第二个方面，这个必然性是什么样的？实际上也就是世界的本质问题。它是决定的还是概率的？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是一分为二，还是一分为多的？一直到 20 世纪以前，几乎所有的

^① 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 页。

承认有必然性的哲学家都认为世界的必然性（本质）是线性的、决定的。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到古希腊哲学的赫拉克利特以“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逻各斯为万物的本原，亚里士多德以“形式因”为事物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再到黑格尔以“纯存在”为开端，通过“有”与“无”的对立统一产生万物，等等，无不透出线性的、决定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以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概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又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更是把这种思想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自然科学的几次大的进步，例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尤其是系统论和非线性科学的出现，基本上否定了传统关于世界本质，也就是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看法，像耗散结构理论等，还提出了事物内部结构（非平衡态）与外部环境（负熵输入）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在 20 世纪科学成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图景告诉我们，世界是一分为多的、非决定的（概率论）、非线性的。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进行哲学概括，并把它推广到价值论、人学、自由与必然、认识论等领域，是现在的系统哲学正在进行的工作。

第三个方面，我们是否正确地认识了这个必然性？牵涉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是认识论问题。在古希腊，是把形式逻辑作为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例如同一律、矛盾律，等等。认为依靠它们便可以找到世界最后的、最根本的原因，从而掌握必然性，掌握世界的奥秘。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方法是以直观有限事物的方法去认识无限，只能得出宗教神学的结论，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于是，从笛卡尔开始，人们把认识的立足点移到了人自身的理性，认为只有思辨的理性才能认识无限。感性直观的方法是不中用的。但康德后来指出，理性的方

法也不能认识无限，它会导致二律背反。黑格尔认为，无限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这个必然性、无限就是理性自身。他主张用辩证的方法来认识必然性。到了马克思、海德格尔，他们认为，传统哲学的思维方法都是以主客分离为前提的，但主客不能简单地分开。哲学要认识的无限，其根源仍在于人自身，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应该以对人的生活世界、现实世界的探索来代替对纯粹形而上学的探索。因为人周围的现实世界本来就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无限与有限的矛盾对立本来就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于是，对客观事物必然性的认识转变为对人与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传统哲学是以主客体的分离作为认识的基础的，但是，马克思告诉我们，在我们认识的世界中，已经包含着人的实践活动了。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在我们认识世界以前，我们已经“在”世界之中，世界已经“为我”而存在了。

现在，在哲学界，再有人提那种“离开人的活动”单纯地研究事物的必然性，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随着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深入，人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日益严重性，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客观世界也是人的一个部分。

第四个方面，我们是否能以语言正确地表达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这个问题以前几乎不成为问题。这个问题是随着 20 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提出的。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八字易象的象的思维方式的意義来。

人都是以语言来表达思想的，很少有人想过语言还有能不能表达思想的一面。斯大林当年写《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认为思想是内容，语言是形式。两者是一体的。这个观点一直到现在的哲学教科书中仍然存在。这个观点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语言不仅表达思想，也能正确反映事物。早在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就提出“能思维的与能存在的是同一的”命题。认为，

凡是存在的，都是能被思维表述的，不能被思维表述的，也都是不存在的，或者就算是存在也不过是转瞬即逝、没有什么价值的。而哲学思维，是以“是”为中心来成立的，是一种由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逻辑思维过程。这就是“逻各斯”。它既是思维的形式，也被看作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也就是后来黑格尔所谓“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一致”。直到 20 世纪，这个观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在这方面中国人更敏感一些。从老子开始，中国人就认识到语言在表述形而上学方面的局限性。“道”是不可言说的，《周易·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这“意”就是对“道”的认识。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怎么办呢，古人就画一个图象，通过对图象的领悟，人们应该可以猜得到一些语言不能表达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关于言不尽意这个思想，后来在禅宗那里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禅宗谈“第一性”也就是形而上学问题时，说了一大堆，只是为了告诉人那“不是”什么，至于那“是”什么，是不能说的，但在这不能说当中，人们也可以想到一点那“是”什么。这个方法被后人叫做“形而上学负的方法”。

语言表述形而上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大致说来，有形式逻辑阶段、思辨阶段、辩证法阶段、现象学阶段，等等。大概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人类意识中非理性的一面。西方哲学也开始意识到语言逻辑所不能表达的人的思想的问题（这里的思想包括无意识和潜意识）。还有人的表达的与他们所想是不是一回事，语言是不是对应客观实在等等，出现了“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是符号（语言）的动物”等等一系列说法，这就形成了现代哲学一次波澜壮阔的转向——语言学转向。参加这次转向运动的，不仅有公认的分析哲学家、语言哲学家，如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而且海

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也在其中。当然着眼点不一样：前者的着眼点是“说可说”，后者的着眼点是“说不可说”。

在这次转向运动中，哲学家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否认了传统哲学对语言的看法，认为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组成的抽象思维并不能表达事物真实的存在（本质）和人的思想。而维特根斯坦后来甚至说，语言表达的根本就不是客观事物，它表达的只是人们的游戏，人们在游戏中遵守规则，所以使用语言。语言之间只有“家族相似”而无实质相同。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如价值、美、自由等等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说了也是白说。

但是，说了白说也得说，否则人们用什么来表达思想呢？就连维特根斯坦本人，尽管他宣称语言不能表达事物本质，他也不得不使用语言来发表他对哲学“本质”的观点。哲学就是这样，自己否定自己。尼采称自己否定了形而上学，可是海德格尔说他就是个形而上学家，而海德格尔本人也被后来的德里达说成是形而上学家。看来这个否定行列还得延伸下去。这是因为哲学家不得不用语言来表示他们对语言意义的否定。这就像那条想要咬到自己尾巴的猫。所以有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根本就不能用语言，根本就不存在哲学。

到了这里，可以说以语言为中心的西方哲学方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八字易象的“象”的思维方法的意义也才凸显出来。

二、术数的哲学意义

术数，指的是中国古代以阴阳五行思想去解释和推算社会与人生命运、人事变化的一种活动，术数这个概念最早出于《汉书·艺文志》，后世沿用。术数多以《周易》为名。

关于术数，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纪晓岚的一段话是

值得注意的。他说：

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论，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惑志，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伙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四库全书·易类小序》）

其中有几个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具有一定代表性，也是说得很正确的：

1. 术数的基本思想是阴阳五行，通过对阴阳五行之间生克制化关系的分析来推断命运；
2. 这种基本思想来自于《周易》；
3. 大部分术数都是骗人的，即所谓“百伪一真”。但其存在，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

这段话的缺点在于没有指出术数在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上是否有什么意义。长期以来，知识阶层一直看不起术数活动。近代西方科学和文化传入以来，由于术数被认定为“迷信活动”，其对中国哲学文化思想的影响几乎是被完全忽略了。研究《周易》者，千方百计要撇清《周易》跟术数的关系，强调占筮只是《周易》的“外表”，《周易》与术数的关系“只是外在的关系”。术数是“借用了《周易》的名义”。至于对其他术数的研究，则一概被冠之以“封建迷信”。只是在近来，学术界对术数、方术等神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才开始渐渐有所认识。

术数与其他神秘文化的不同。一是术数与“卜”不同。一般的研究对此往往不加区别。但我认为两者是不同的。其区别在于：卜认为天是具有人格意志的神，是事奉和揣摩的对象。卜是以火灼龟甲探知“天意”的一种活动，“卜”为龟甲裂开时的象声词；而术数则认为天是由阴阳五行组成的“自然之天”，是研究对象。^① 术数就是通过特定的数字和象来分析天地万物（包括人）的阴阳五行之组成，以此了解自然和社会规律。卜产生于商代，东汉以后逐渐消亡；^② 而术数作为一种具有社会规模的活动，是西汉以后才兴起的。^③ 二是术数不同于巫术。其区别在于，术数多以《周易》为名，只负责对社会和人事变动的解释与预言，而巫术除了这个以外，还企图以超自然的力量干预社会和人物的变化。

我认为，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的社会意识，术数活动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深受术数的影响，术数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无其他科学可比。这点与西方哲学不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想想《周易》的情况就可以了。术数活动并非中国独有。亚里士多德等人也从从事过烦相学的研究。但以一本占筮之书作为整个哲学的开端，这只发生在中国。所以，术数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我认为，术数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术数是古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古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要把握事物运动规律，预见事物的发展趋势，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术

① 如果说在《易传》之前的《经》的占筮活动还不能这么说的话，那么，在《易传》把易作为“太极阴阳”之后，以《周易》名义的术数活动就是对“自然之天”的分析了。

② 见郭志城等著《中国术数概观：第一部分卜》。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③ 见张明喜《神秘的命运密码》，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数。因此，术数在古代也被作为一种经验的实证活动。明代的方以智把整个学术分为“质测”、“宰理”和“通几”三大类，其中“质测”是研究“物理”（事物规律）的。而术数就在“物理”之列，还排在首位：“考测天地之象，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通雅·文章薪火》）这“象数”指的就是术数。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古代的术数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曾有一个总的评价：

术数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了科学。这些自然力是什么，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①

中西方哲学的起源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说，古希腊哲学起源于对天地万物的“惊异”，所以哲学是自由、闲情逸致的产物。古希腊人以数学、几何学作为思考、解释世界本原的基础；但中国哲学却并非自由和闲暇的产物。中国哲学产生于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起源于对“天命”的思考与探索。从孔子开始就讲“命”，甚至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后来儒、道、释诸家，在这个问题是惊人的一致，几乎没有否定命的。对“命”的探索，是与对“道”的把握紧密相连的。人们通过“命”去理解、把握“道”；又通过对“道”的理解与把握去探索“命”。术数，作为自古以来人们预测命运的工具，理所当然地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57页。

哲学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个发展动力。

2. 术数为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实证的根据

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但道离不开器，器体现出道。人们是在对器的了解中认识、体会道的。离开了实证经验的支持，哲学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关于阴阳五行思想的实证支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天文、气象和农业生产等经验科学；二是中医、气功、针灸等；第三个方面就是术数，而且这个是相当重要的。这是因为术数所验证的范围更广泛也更重要。其他经验科学只能论证“自然之天”，唯有术数能论证“自然之天”与“道德之天”的合一。《易经》的八纯卦本来是八种自然物，是代表“天道”的，如何能成为“人道”，以达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的“天人合一”呢？那就是以占筮来证明。

例如易占之中有一规矩，不合道德之事不占，占了也不灵；再如“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说卦传》），用占筮来说明“当位”、“不当位”乃天之理。这都证明了“天”的道德意味。《易经》本来就是一部占筮之书。在春秋时期，以《易经》占筮又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和军事斗争。《左传》、《国语》中记载了大量《易经》术数占筮的实例，这对后来《周易》思想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应该说起了很大作用。汉以后的易学家多否认占筮对《周易》的始源性意义，认为“象出于意（义理）”故可“得意而忘象”（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近代易学家尚秉和先生力排此说，认为“解易不可离象，解象不可离筮”，就是看到了占筮对《周易》儒家思想之“义理”的作用。这个观点现在基本上得到了认同。

、再如，术数之一的相术，将手相定为九宫八卦，其乾坤二宫即分别代表父与母。如这两宫被乱纹冲破，便象征父母有难。这也是术数对《周易》思想的验证。宋代的人性二元论，认为人

性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为善，气质之性由于个人所禀之气不同而有善有恶。今人往往认为其玄想的成分太重，缺乏实证。其实它是有实证的，这个实证即是相术和八字推命术，二者均极看重人生所禀阴阳五行之气对个性的影响。所谓五行相对于五义（仁义礼智信），五行之气过与不及对人性的影响等等，都是在术数中广泛应用的。

至于五行相生相克，阴阳各具不同性质功能等等，无一例外地为各种术数活动所遵循。《周易》为各种术数活动提供理论依据，术数活动又在实践中反复地验证这些理论假说。所以说术数“皆《易》之支派”，也就是这个意思。《易传》中有大量关于占筮的方法、功用的论述。正是由于有术数活动作为其“实证”的基础，《系辞》中关于八卦产生的描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才被认为是天地宇宙生成过程的描述，《系辞》也才敢于宣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3. 术数以自己的活动促进了阴阳五行思想的发展

这点可以从阴阳与五行的关系演变中看出来。阴阳与五行思想从源头上说本为两种思想。功用上也各有不同。五行侧重于证明事物的组成要素，阴阳侧重于说明事物的变化动力与过程。《易经》一开始只是用阴爻和阳爻两个范畴来表示和判断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的发展变化，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概括说明万事万物的组成与变化，可以说达到了最大程度的抽象。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占筮活动中可供参考的要素太少，这样就不得不使一个爻或一个卦象征众多的事物，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未能照顾到各类事物性质的特殊性，包含的事物多了，当然就难以做到具体化。

又如卦辞和爻辞往往只能提供事物发展趋势的吉与凶两种可